



美国为何发动贸易战

□ 王东京

请注意，这例子暗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分工可提高效率，二是没有贸易自由就没有分工。为何说没有贸易自由就没有分工？还是用上面的例子，假如甲专种粮食而乙专织布，但若甲不能用粮食换乙的布，或乙不能用布换甲的粮食，不能互通有无，两国怎可能形成分工？读者想想，美国作为国际分工的最大受益者，反对贸易自由是不是毫无道理？

美国当然不会承认自己没道理。特朗普说，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是因为美中贸易不平衡，美国长期逆差，中国顺差。听上去似乎在理，但细想却不对。美国贸易逆差说明什么？说明美国从中国买到了他们所需要的商品，而中国却未从美国买到所需要的商品，而只是用商品换回了美元。由此看，中国贸易顺差并不代表中国占便宜；美国贸易逆差也不代表美国吃亏。

想深一层，中美贸易要平衡，对美国来说其实易如反掌。中国政府多次表示希望扩大进口，可美国的高科技产品却始终不卖。自己的商品不卖怎会不逆差？再有，战后美元一直是国际中心货币，美国只要印出美元，就可在全球采购商品，而中国要进口美国商品，必须先出口商品换回美元。这样一来，美国贸易就难免有逆差。事实上，美国今天不仅对中国有逆差，对全球100多个国家也有逆差。

上面的道理特朗普不会不懂，所以我不相信美国发动贸易战是为了贸易平衡？另外还有个证据：美国打贸易战，主要一招是对中国商品加关税。对中国商品加关税能扭转美国的逆差么？美国对中国的逆差会减少，但不会改变美国对全球的逆差。理由简单，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大多数商品美国自己不生产，不从中国进口就得从其他国家进口。算总账，美国的逆差不会变。

由此可见，所谓“贸易平衡”不过是美国的一个幌子。醉翁之意不在酒，真实目的是要维护美元霸权。战后美国称霸世界，靠的就是军事霸权与美元霸权。曾记否？上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崛起，日元挑战美元，1985年美国却用一纸“广场协议”将日元击败了；1999年欧盟19国推出欧元，2002年进入流通，结果到2009年欧洲发生主权债务危机，至今欧元一蹶不振。2010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国际化提速，于是美国把中国当成了对手。

美国将中国视为对手是他们的事，我们管不了。当下的问题：美国发动贸易战我们要怎样应对。容易想到的是中国对美国商品也加关税，以牙还牙。这样做当然无可厚非，也有必要。可冷静地想，加关税未必是反

制美国的唯一选择，甚至不是最佳的选择。加关税虽能抑制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但伤敌一千，也可能自损八百。这当然不是上策。

上策是什么呢？前面说，美国最担心的是美元霸权地位被动摇。民间有句俗语：打蛇打七寸。既然美国要维护美元霸权，那么我们就应去动摇美元霸权，若不一将其打痛，日后还会得寸进尺。虽说目前人民币无法代替美元的地位，但美元霸权今天已是岌岌可危，我们完全有能力动摇美元的地位。不是吗？美国之所以为维护美元霸权大动干戈，其实是他们自己对美元底气不足，心虚而已。

简单说说美元吧。1944年，由美国主导建立起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从此美元替代英镑成为国际中心货币，当时美元靠的是黄金支撑；上世纪70年代初发生美元灾，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改用石油支撑。可随着石油储量减少和新能源的出现，美国意识到用石油支撑也难以继，于是想到了用“碳排放权”支撑，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美国到处游说，可惜多数国家不买账，这样就给美国留下了心病。

是的，今天美元霸权正在失去支撑，这确实是美元的软肋，对此中美双方都清楚。而作为对美国发动贸易战的反制措施，今年3月26日中国原油期货在上海期货交易所正式挂牌，而且中国政府承诺，任何接受人民币结算的石油出口国均可用人民币在上海黄金交易所兑换黄金。可想而知，中国此举对美元霸权将意味着什么。

读者也许要问，美国发动贸易战会因中国推出原油期货而罢手么？目前不好说，还有待观察。不过即便美国不罢手，中国还有更大的牌可出。我想到的是，美国现在国债中有4万亿美元由外国机构持有，而中国就持有约1.2万亿。可以推定，假如中国大量抛售美债，美债收益率必上升；而美债收益率上升，必会推高美国的融资成本；而融资成本上升，必会打击美国股市和经济。

说来也巧，中国的底牌并未亮出，可美国财长姆努钦4月6日在接受CNBC采访时表示：对中国有可能抛售美债这一杀手锏“完全不在乎，因为美债有很多买家”。他的话不知别人是否相信，我是不信。这里只问一句：当美债收益率升高，有朝一日美国无力兑付其收益时美债会否贬值？美债一旦贬值，后果怎样无需我说出来吧！



中美贸易摩擦的缘起与应对



□ 屠新泉 娄承蓉

自年初美国宣布对太阳能板和洗衣机征收关税到之后的铝铝关税，再到近期针对中国301调查的一揽子商品征税，特朗普坚持对华贸易制裁，美国在保护主义道路上渐行渐远。尽管中国理性地予以一一回应，但中美贸易摩擦似呈现不断升级态势，“贸易战”成为政策讨论的焦点。

表面看来，延续一贯的做法，本轮美国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行为仍然打着减少中美贸易逆差的旗号。然而已有诸多研究表明，美国贸易逆差是由经济因素决定，受客观的市场经济规律所支配，因此发动贸易战根本无助于问题的解决。随着贸易摩擦的日趋纵深，在贸易逆差表象背后，特朗普政府发起本轮贸易摩擦的实际目的却日渐清晰。

兑现竞选承诺。在本轮中期选举中，五个“锈蚀带”州都会改选国会参议员，且均为民主党人谋求连任。特朗普执政以来，一直试图在贸易上做文章，加之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在大选期间曾经成功打动选民帮助特朗普最终胜选，因此特朗普可以通过重拾大棒借以履行竞选承诺，再次回应选民诉求。此外，基于特朗普一贯的高压谈判策略，在本轮贸易摩擦中，他可能以此威胁中国在谈判中做出更大的让步，将谈判的胜利果实作为政绩为之后的连任奠定基础。

遏制中国的技术进步，抑制中国产业升级。在4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在低附加值的国际产业链中低端取得显著成就，目前正探索科技创新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国取得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给美国带来了巨大压力，因此这

次301调查针对的基本上都是“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行业，并指控中国政府市场干预行为削弱了美国的技术比较优势。除关税措施外，美国还就中国的技术许可做法和对外商在华投资限制向WTO提起诉讼。事实上，在科技这一战略高地的争夺问题上，美国一直在通过组合措施收窄中国的技术传输渠道。而上述两套措施加在一起，透露出这不过是美国在继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再次停摆、强化对中国企业在高科技领域对美投资审查、对中国知识产权问题更多责难之后，对科技行业的又一次聚焦。

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公布对中兴通讯公司长达7年的销售禁令，直接从源头上切断了中兴的生存之路。这一中美贸易摩擦中的最新进展再次凸显，美国对华优势并不在其下游需求，而在其依托技术优势在相当程度上控制着上游供给。但如果美国一味试图通过限制出口来压制中国的产业和技术进步，其结果很可能适得其反，反而促使中国不惜一切代价形成自己的上游供给能力，而进一步削弱彼此间的分工合作和相互依赖。这从长远来看对两国关系绝非好事。

从中美贸易摩擦的互动来看，迄今为止，中美双方的你来我往主要是口头上的，还没有直接或非常明显的行动，因此现阶段更像是一场“舆论战”。目前来看，谈判似乎更有可能成为两国的下一步之选。但未来特别是长期的走向将有赖于特朗普个人及其团队的想法、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的政治基础以及中方的主张。

从目前来看，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是战术性、反应性和短期性的。这一特点的积极影响在于尽管其抛弃WTO，不注重多边主义这一底线，但至少也还要遵循商业规则，考虑美国国内商界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关切。中国正在扩大服务业特别是金融领域的开放，如果他头脑清醒，美国仍然有可能取得中国关键领域的开放准入。但消极的一面是缺乏政策的一致性，甚至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因此并不排除其采取极端措施的可能。

同时，中美经贸关系正在经历

不可逆的系统性变化。虽然中美贸易结构仍然互补，但是长期来看，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使得同质化的竞争和战略内容都将显著增长，特别是在高端制造业和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其结果是中国的经济追赶过程将不免造成利益的分割，与美国作为守成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将成为常态。或许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美国对中国发生政治和经济体制演变的期望彻底落空，中美之间的模式和道路之争将很难为两国的经贸合作创造一个和谐的氛围。

综合上述因素，我们的判断是，本轮中美贸易摩擦蔓延恶化的概率很小，即便蔓延恶化也不会持续太长时间。谈判将极有可能是双方最终的共同选项，但是长期而言，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仍将持续。

面对美国的贸易战威胁，中国政府不排除一切选项。事实上，贸易伙伴之间因关税、配额、垄断、汇率、知识产权等制度差异极易产生贸易摩擦，理性的选择是通过谈判重新调整贸易条款（或制定）和行为，历史经验也表明这是贸易摩擦的最终解决途径。而美国使用20世纪80年代锈迹斑斑的武器指向今天的产业政策问题，以单边行为挑起摩擦并不明智。从长远看，美国在贸易方面提出的要求与我国的发展方向并无实质性分歧。目前，中美急需排除信息误读，开诚布公地谈，美国需要清楚表示到底想要什么，中国衡量是否能够在能力范围内和不触犯原则的情况下满足要求，这样有助于双方重回合作共赢轨道。

我们要保持定力，继续按照我们的需要和步伐来推进必要的改革和开放。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在主旨演讲中宣布，中国将在大幅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动扩大进口等方面采取重大举措，推出有标志意义的举措。在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方面，2017年年底宣布的放宽银行、证券、保险行业外资股比限制的重大措施要确保落地。风物长宜放眼量，中国不会重蹈日本的覆辙。

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面临哪些难题

外部环境不再宽松。我国在本轮经济全球化中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和利益格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逆全球化”思潮兴起，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和内向倾向明显。美欧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传统的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国际产业转移已经接近尾声，一些更具低成本优势的国家和地区逐渐加入到全球竞争中来，我国专业化于价值链中低端的条件不复存在，原有发展路径似乎已经走到尽头。

内部环境约束增强。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政策优惠逐步取消，环境约束日益增强，土地供应日益趋紧，各类生产要素价格不断上升，传统低成本优势不复存在，而新的竞争优势却未随之建立。处于这一发展阶段，中国既面临着来自发达国家的前方“堵截”，又面临着来自更具低端成本优势国家的后方“追兵”，因而容易陷入“比较优势真空”困境并面临可能的“产业断档”风险。

对外开放“天花板”效应显现。以贸易为例，2016年中国出口贸易占国际市场份额比重约为13.9%。从既有国际经验来看，这一比重已经超过了二战之后德国和日本曾经达到的最高历史水平，与美国所达到的最高历史水平也基本接近。在规模基数已经达到较高水平情形下，再继续保持以往的高速增长已经不可能。中国出口贸易已经触及到了“天花板”，进一步扩张的空间极其有限。在贸易投资一体化的今天，中国外贸发展具有典型的“外资嵌入型”特征。因此，“天花板”约束不仅发生在贸易层面上，同样存在于外资利用层面上。

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有哪些机遇

“一带一路”的建设机遇。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表现出引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积极姿态。“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的仅仅几年时间里，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支持，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合作协议。“一带一路”的“朋友圈”正在不断扩大的特征事实表明，中国主张的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发展和治理模式，正在得到世界的认可。

双向开放的战略机遇。开放型经济本质是一个既有“引进来”也有“走出去”的双向循环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开放发展主要以“引进来”为主并取得了显著成就，积累了丰富经验，这为进一步高质量“引进来”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从规模上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利用外资已经到了基本平衡的发展阶段。高质量“引进来”与大踏步“走出去”，构建双向循环的开放型经济系统，有利于充分利用和优化整合全球资源，有利于构建以中国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有利于拓展和深化开放合作的范围和层次。

消费需求升级的战略机遇。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的中国，不仅体现为数量意义上的人口众多，更体现在经济意义上的需求之大乃至需求的高端化。因此，在要素成本优势不断丧失

的条件下，依托巨大的国内需求，不仅可以发挥需求引致产业转型升级的传统机制作用，而且可以据此吸引价值链中的中高端生产环节向国内转移，虹吸全球优质生产要素向国内集聚，培育新的开放发展竞争优势。

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的思路

继续倡导并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与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只能被动地接受现有国际经贸规则和体系的处境不同，经过40年的开放发展，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已经从世界经济中简单单一的“因变量”身份，向“自变量”和“因变量”双重身份演变，基本具备了为完善全球经贸规则贡献中国力量的基本条件。虽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大势不会逆转，但当前“逆全球化”思潮兴起的确会严重

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

□ 张二震 戴 翔

核心阅读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对外开放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对外开放显现“天花板”效应，我们要把握好“一带一路”、双向开放、消费升级等机遇，倡导并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重塑以创新引领的对外开放新优势等，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

们要讲好和宣传好“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基础，要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真正能够感受到包容、普惠、共赢、主客便利、抉择相容的合作模式和机制。

充分利用好大国经济角色转变的战略机遇。我国以往对全球经济的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我国经济作为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身经济增长和快速发展为世界经济的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在供需两个层面上实现了对全球经济资源对优化配置，表现为通过发挥要素优势吸引国际资本，参与全球要素分工，形成了庞大的生产制造能力和出口能力，为国际需求市场提供了质优价廉的产品，提高了世界福利水平。伴随大国经济角色的转变以及传统优势的丧失，未来提升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和贡献力，需要更好地发挥本土市场需求，同时实现两个方面的转变。一是在实现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带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共同发展，让其他国家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顺风车”和“便车”。二是成为全球产品的主要需求者和全球资本的主要供给者。

重塑以创新引领的对外开放新优势。实施创新驱动引领，不仅是弥补传统优势丧失的需要，也是提升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不仅是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需要，也是顺应全球新一轮产业和技术革命发展趋势的需要。总之，要以质量提升破除数量上的

“天花板”约束。目前，我国人力资本日益丰富、产业配套齐全，制度和政策环境不断完善，创新发展有了一定的基础。需要指出的，通过创新引领以重塑开放发展新优势，一定是开放式的创新，而不是封闭式创新。尤其是在当前全球创新链深度演进时期，实施开放创新发展战略，不仅有助于追踪全球前沿科技和创新态势，更有利于整合和利用全球创新要素，从而更加有效地服务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此外，创新是多方面和多维度的，并非是指单一的科技创新，同时也包括贸易模式的创新、管理模式的创新和开放模式的创新等，据此推动开放发展朝着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综合竞争优势的新局面转变。

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既是为了破除国内体制机制的约束，也是为了迎合国际经济规则高标准演进的需要，同时更是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和提升制度话语权的必要基础。其中要以积极探索建设自贸区和自由贸易港为依托，实现政府监管模式和企业生产模式的重大创新和突破，实现我国开放从政策性向制度性开放的全面升级。通过不断完善开放体制机制的安排，在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治理新格局、主动对接国际贸易新规则的同时，努力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为引领开放型世界经济树立“中国榜样”。

